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

〔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 著

〔中〕张振辉 译

中国的使臣 卜弥格



大象出版社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

B979.05174

中国的使臣 卜弥格

[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 著

[中]张振辉 译



今本 Xu

兔 quey

os nonnulli emrens
qu

X
Aus Regia

Mis 凤 Fim

rem 凤 Hoan

Y
Galline sylvestris

鸡 Y
鸡 K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的使臣——卜弥格/ (波兰) 爱德华著; 张振辉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1.5

(当代海外汉学译丛)

ISBN 7-5347-2604-2

I. 中… II. ①爱…②张… III. 卜弥格 - 生平事迹 IV. K835.1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5871 号

中国的使臣——卜弥格/[波兰]爱德华·卡伊丹斯基

译者 张振辉

特约编辑 谢方

责任编辑 韩岩

责任校对 张静燕 霍红琴

书籍设计 张胜

出版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 电话:0371—5726194

印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张 11.75印张

字数 289千字

印数 1—3000册

定价 22.00元

总序

任继愈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世界知道中国,不自今日始,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① 文明交流的深度、广度也是近代超过古代。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其间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接触后发生冲突,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并使它为我所用的情况。这种水平相当交流,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收到互相融会、双方受益的效果。进入近代,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不再领先,往往借助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明中期,如天文、历算,往往学习西法,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文化交流、交融、吸收、互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下,才可以从交流中采取主动,吸取其可用者为我所用。当国势衰弱,文化停滞,科学落后时,往往在交流

^① 第一次在汉朝,公元前1世纪,开通了丝绸之路;第二次在唐朝,公元7~8世纪;第三次在明朝,公元14~15世纪;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19世纪;第五次在“五四”前后,20世纪初到现在。

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去对外来文化选择的主动权,成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鸦片战争以后,在长达百年的这一段时间里,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有些是我们主动吸收的,也有些是中国所不愿接受的,也有些被迫引进的。

历史告诉人们,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世界上一个地区出现了经济危机,全世界都会受到震动。文化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紧密程度,却也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趋势。当前文化交流的条件大大超过古代,传递手段之迅捷,古人无法想像。因此,文化交流的责任也远比古代社会沉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负担着 21 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艰巨任务。

为了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全面状况,本书系分为三个系列:

- 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翻译);
- 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翻译);
- 三、海外汉学研究(著作)。

“汉学”这一名称,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同,也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准备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我们只是把过去和现代人们已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著汇集起来,总之,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之内的学术著作。正如“现代新儒家”,这个名字的内容,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标准。因为它属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本书系也将包括这类译著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愿借这个领域,作为联系海内外研究古今中国文化的桥梁,为人类精神文明略尽绵薄之力,我们的初衷就算达到了。

我们这套书系,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未来负责的心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高品位的世界文化。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总结历史成果的时代。我们以科学的良心,如实向世界推进文化交流,我们介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在当代人中,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只有在健康、光明、理性、科学为主干的文化指引下,人类才可以

避免失误,走向和平。每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深知和平的可贵,战争的罪恶。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正直善良的学者,出版这套书系,期望其社会效益不限于书斋以内,更寄希望于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泯除非理性的强权暴行,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光明的大道。为中华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世界人民增加友谊与理解。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编辑委员会

- 顾问:** 陈乃芳 (Chen Naifang) 陈翰生 (Chen Hansheng)
季羨林 (Ji Xianlin) 李学勤 (Li Xueqin)
饶宗颐 (Rao Zongyi) 汤一介 (Tang Yijie)
王元化 (Wang Yuanhua) 周一良 (Zhou Yiliang)
- 主编:** 任继愈 (Ren Jiyu)
- 执行主编:** 张西平 (Zang Xiping) 周常林 (Zhou Changlin)
耿昇 (Geng Sheng) 杨煦生 (Yang Xusheng)
- 编委:** 柴剑虹 (Chai Jianhong) 程裕祯 (Cheng Yuzhen)
高建平 (Gao Jianping) 何其莘 (He Qishen)
李明滨 (Li Mingbin) 孟华 (Meng Hua)
任大援 (Ren Dayuan) 黄勃 (Huang Buo)
吴隽深 (Wu Junshen) 谢方 (Xie Fang)
严安生 (Yan Ansheng) 阎纯德 (Yan Chunde)
严绍瑗 (Yan Shaotang) 杨保筠 (Yang Baoyun)
张德鑫 (Zhang Dexin) 张国刚 (Zhang Guogang)
周发祥 (Zhou Faxiang) 汪前进 (Wang Qianjin)
- 国际编委:** 李福清 (Boris L. Riftin) 何莫邪 (Christoph Harbsmeier)
孟德卫 (David E. Mungello) 许理和 (Erik Zürcher)
常志静 (Floria C. Reiter) 杜德桥 (Glen Dudridge)
陈志让 (Jerome Chen) 施舟人 (Kristofer M. Schipper)
谢和耐 (Jacques Gernt) 柳存仁 (Liu Ts'un-yan)
钟鸣旦 (Nicolas Standaert) 罗致德 (Otto Ladstätter)
魏丕信 (Pierre-Étienne Will) 史华罗 (Paolo Santangelo)
安乐哲 (Roger T. Ames) 陈荣照 (Tan Eng-Chaw)
罗多弼 (Torbjörn Lodén) 杜维明 (Tu Weiming)
弥维礼 (Wilhelm R. K. Müller) 伊维德 (Wilt L. Idema)



卜弥格像, 见之于基歇尔《中国图说》

译者序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和外国的经济及文化交流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种交流不仅将中国古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广泛地传播到了世界各国,显示了我们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领先地位,而且也从外国吸取了在物质和精神上于我们有益的东西,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丰富我们的文化宝库。

早在公元前的商、周至战国时代,我国丝绸生产的技术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那时候,中国的丝绸从西北地区开始贩运到了中亚细亚和印度诸国。

统一后的秦朝,声名远扬。古代印度称中国为秦,至今西方许多国家语言中的中国名称,也来源于“秦”。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派张骞率三百人出使西域,和西域的乌孙国结成联盟。张骞后来又派遣副使去当时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诸国。相传他的出使还使西域的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和大宛的名马传入了中国。张骞西使之后,汉朝的使者和商人们开始沿着他开辟的这条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接踵西行,从此大量中国的丝帛锦绣便不断西运。与此同时,西域各国的奇珍异宝也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继张骞之后,汉名将班超也曾奉命赴西域,为了平定匈奴贵族的叛乱,保护西域各族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他在西域活动了三十二年,还曾遣使赴罗马帝国,他的使者到了条支的西海(今波斯湾)才返回。这时期,中国

的丝绸、纸和铁也传到了印度。而印度的佛教在东汉时期通过不同的渠道,也传入了中国。

魏晋时期,东西商贸往来不断,丝绸之路上的重地敦煌成了胡商会聚的地方。在公元五至六世纪,我国虽南北朝分立,但丝绸之路的交通线上却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景象,北朝经陆路与经济文化比较繁荣的萨珊朝波斯相连,波斯人从此开始到东方来经商,把他们信仰的祆教也传入了中国。佛教这时在中国的南北更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鸠摩罗什、真谛等印度、中亚和南亚的僧人来华,译出了许多重要的经典。东晋僧人法显于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从长安西行,渡流沙,越葱岭,走遍北、西、中、东天竺,后又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前后十四年,游历了三十余国,归国后与佛驮跋陀罗合译律论六部,二十四卷,并撰写了《佛国记》一书,流传于后世。随着佛教的传布,渊源于印度以至犍陀罗的开凿石窟、绘制壁画、雕塑佛像等佛教艺术也自西而东地传入我国,在新疆、甘肃、山西、河南等地与我国传统艺术融合,创造了如云冈、龙门、敦煌石窟等杰出的艺术作品,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传世之宝。随后佛教又从中国向东传入朝鲜和日本。一大批中国人经朝鲜移居日本时,也带去了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朝鲜和越南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曾长期使用汉文作为他们的书面文字。

隋朝统治时期,隋炀帝也曾派人去张掖招徕西域商人。唐太宗对境外各国采取开放政策,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唐朝时曾接受不少外国青年来长安学习,他们回国后,传播唐朝文化,有的还留在中国,出仕朝廷。此外缅甸、中亚石国和康国的舞蹈当时也来长安表演。唐代中国疆域广阔,更为中西交通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经过长达一千多年的开辟,这条丝路逐渐形成了两条主要的干线:它们东起渭水流域,经过河西走廊,或经今新疆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在疏勒(今喀什市)以西越过葱岭,经大宛和康居南部西行;或经今新疆塔里木河南面的通道,在莎车以西越过葱岭,经大月氏西行,然后会于木鹿(今马里),再向西经和犊城(今里海东南达姆丹附近)、阿蜜(今

哈马丹)、斯宾(今巴格达东南)等地抵达地中海东岸,转而去罗马各地。除了陆上的丝绸之路外,这时也兴起了海上的丝绸之路。不少波斯和大食商人都会聚在广州、泉州和浙江、山东沿海一带。数世纪来,它已成为古代中西交通和发展商贸最重要的线路,促进了中西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唐代还把中国的造纸和纺织技术传入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唐朝僧人玄奘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从凉州出玉门关西行,赴天竺,经历十七年后回长安,翻译经、论七十五部,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撰写了《大唐西域记》一书。他的翻译和著作不仅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也为研究佛学及中亚和南亚各国古代的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唐代另一僧人鉴真应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等人之邀,于公元754年底,与比丘法进、昙静、尼智首、优婆塞潘仙童等一行东渡日本,曾给天皇、皇后、皇太子及僧俗四百余人受戒,后在大佛殿西建戒坛院,又曾仿唐建筑造唐招提寺。他还将大量佛经佛像,中国的药物和艺术品种带到日本,对日本医学、雕塑、美术和建筑艺术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印度僧人不空(705—774年)等传入的密宗一度兴盛,甚至影响到后来的西藏和蒙古的佛教。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叙利亚人阿罗本等教士经波斯来到长安,在这里译经传播基督教景教,曾建寺一所,称波斯寺,后又称大秦寺,有教士二十人,不久便向全国各地发展。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称该教在中国“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可见当时流传之广。后来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下诏禁止佛教流传,拆毁天下寺庙,也波及该教,有两千余教士被驱逐,该教因此绝迹中原,但仍流传于契丹和蒙古。除景教外,摩尼教、伊斯兰教等这一时期也先后传入了中国。

公元九至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向东南沿海转移。北宋时期,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扬州等城市设市舶司,对进出口商船检查抽税。南宋的贸易盛于北宋。宋人航船当时使用的水针罗盘也曾为阿拉伯人仿效采用,后传入了欧洲。宋代制瓷业发达,瓷器是继丝绸之后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出口东南亚国家、印度、

波斯和非洲。宋朝从国外则主要输入香料、象牙、犀角和珠宝。日本、朝鲜、越南这些使用汉文的国家也广泛地用宋朝的活字印书。宋代流行的禅宗和理学,对日本和朝鲜有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阿拉伯世界的兴起,开始了中西海上的往来。十二世纪初,一支犹太人来华定居,带来了他们信奉的犹太教,但他们除保存了犹太教的基本教义之外,也吸取中国文化的精髓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如他们称“惟一真神”为“天”,名其教为天教,称他们的经典《圣经》为《道经》,名其会堂为“尊崇道经寺”等。中国与波斯、阿拉伯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通过伊利汗国展开的。中国的天文、历法、医药学、雕版印刷及算盘都传入伊利汗国。火药也于十三世纪传入了伊斯兰国家。蒙古人元朝的西征,占领了中亚和西亚的广大地区,使东西驿路畅通无阻,许多欧洲的使者、教士和商人如马可·波罗都沿着古老的丝路来到中国,使这里又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马可·波罗回到欧洲后,著有《马可·波罗游记》,极力宣扬中国的繁荣、富庶和高度发展的文明,更增进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

明朝的文化交流,不论官方和民间都超过了以往。明朝初期,成祖皇帝于永乐三年(1405年)派太监郑和率领官兵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先后七次(一说八次)下西洋,经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最远到达非洲的东海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每到一地,他们都以中国的瓷器、丝绸、铜铁器皿和金银等物换取当地的特产,不仅和亚非各国进行了互利的商贸活动,而且也加强了和它们的联系。这些地方,至今还保存了不少郑和活动的遗迹。公元十七和十八世纪,也就是明末清初,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这时期,欧洲虽然脱离了中世纪的蒙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生产力依然比较落后,而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商品经济在这时期也得到了发展。因此,明末清初的中国,在经济上的总体实力,依然是领先于欧洲诸国的。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一些强国便竭尽全力地向远东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竞相追逐他们视为珍宝的中国的

丝绸、瓷器和医药以及东南亚的香料等等。中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更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向往,热切希望进一步地了解这个当时在他们看来颇为神秘的东方大国,因此在欧洲,便形成了一股中国热。与商贸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扮主要角色的是欧洲诸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一方面,他们把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中国,帮助中国人观察天文,绘制地图,铸造大炮,并与中国的学者合作,翻译欧洲的科学著作。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自己在中国见到的一切,向欧洲作详细的报道,并且通过实地考察,钻研中国的经典,将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化介绍给欧洲,为欧洲了解中国的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有波兰十七世纪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卜弥格是第一个将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化成果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作为一个旅行家和渊博的学者,卜弥格在他的一生中,不仅到过中国,而且也曾多次到过非洲、印度和东南亚各国,通过对这些地方长时期的考察和研究,他撰写了大量有关这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动植物、矿物、医学、历史、地理、人种学、哲学、语言学和人民的生活习俗等的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在他生前和身后很少得到出版,有的甚至被人剽窃、篡改或者冒名顶替地发表,但是它们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卜弥格在古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开创了一个向西方全面介绍中国文明的新时代,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使他成为我们永远敬仰的伟大先驱。

我国虽然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人介绍过卜弥格的生平和事业,如冯承钧在1931年5月出版的《景教碑考》和张星烺在1934年出版的《欧化东渐史》等著作中都对卜弥格作了简短的介绍。冯承钧还曾翻译法国汉学家沙不烈的著作《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商务印书馆,1941年出版)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著作《卜弥格传补正》(1962年发表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上)。可是由于缺少有关他的历史资料,未能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学术文化界对于这位十七世纪的波兰汉学家和中

国人民的朋友,引起了更大的注意。1990年,波兰著名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先生的一部介绍卜弥格的普及读物《明王朝的最后特使——卜弥格传》于1988年在波兰出版之后,我在朋友的鼓励下,把它译成了中文,后发表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欧语系主办的《东欧》丛刊1995年第3期至1998年第4期上。最近几年,卡伊丹斯基先生应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大象出版社之约,又完成了《中国的使臣——卜弥格》这部颇有分量的学术专著,于1999年由波兰“书与知识”出版社出版,使波兰和世界各国对卜弥格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更加深入了一步,同时也将使我国的学术文化界和广大读者对他有更多的了解。

卜弥格,号致远,原名米哈乌·博伊姆,1612年生于立陶宛的利沃夫城。他的家是从匈牙利迁徙过来的。他的祖父耶日·巴维尔·博伊姆是个贵族,当过波兰国王斯泰凡·巴托雷的秘书,早年信过新教,1590年接受了天主教信仰。父亲巴维尔·耶日·博伊姆是一个商人和著名的医生,曾担任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三世的御医。卜弥格是耶日的六个孩子中的一个,他十四岁时生了一场大病,当时就曾发誓,如果恢复健康,就要献身于远东的传教事业。卜弥格在利沃夫耶稣会的高等学校毕业后,曾在波兰的卡利什城学过哲学,后在克拉科夫学过神学。他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非凡的才能。正因为如此,他来到罗马后,罗马耶稣会马上接受了他去中国传教的请求。实际上,卜弥格去东方,并没有把他的工作重点放在传播基督教上,而是以他的全部身心和力量,投入到了对东方进行调查研究和科学考察的伟大事业上。

1643年,卜弥格从葡萄牙的里斯本乘船出发,途经佛得角群岛,绕过非洲南端,来到了非洲的东海岸,到过塞纳和莫桑比克等地。后乘船来到印度的果阿,再经印度南部沿海,经马六甲海峡和今越南南部沿海,来到了当时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澳门。他在澳门学了几个月的汉语,还在一个耶稣会的学校里教过书。过了不久,他登上了海南岛,被安排在海南岛琼州附近定安城里新成立的一个耶稣会传教士

使团里工作。卜弥格在这里住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考察和研究工作。当时清军已入关,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检于1644年自缢于煤山后,许多皇亲国戚和文武大臣纷纷逃往南方,原任贵州总督的桂王朱由榔于1646年在广东的肇庆称帝,年号永历。这时候,清军也打到了南方各省,占领了福建和两广的一些地方。海南岛上因此发生了反对明朝的暴动,岛上和明朝政府有公事往来的耶稣会使团于是成了攻击的对象,卜弥格曾被关进了监狱。后来越狱逃跑,来到了肇庆永历的朝廷里。

南明朝廷的宰相庞天寿早年曾是万历皇帝朝廷里的一个太监,他在北京时,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南明宫廷里当时有个奥地利耶稣会传教士瞿安德,他曾给宫里的皇太后、皇后、太子和几个宫女受了洗,所以南明王朝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小朝廷。卜弥格来到这里后,不仅受到了皇帝和宰相的友好接待和留居,而且被皇帝封官授爵,和宫廷的关系十分密切。1648年,卜弥格经湖南、河南,来到了陕西的西安,他在这里见到了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块碑立于唐朝,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它证明基督教的一派景教早在唐朝就曾流传于中国。卜弥格不仅复制了碑文(即《西安府碑文》),而且把它翻译成了当时在欧洲通用的拉丁文,并对它作了诠释,这是一篇当时及后来欧洲得以了解基督教在中国早期传播情况和中西交往情况的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卜弥格到西安后,由于清军已经占领广东省的许多地方,直接威胁肇庆,永历被迫将他的朝廷迁到了广西的南宁。卜弥格离开西安后,又经四川、云南,来到了广西。

永历由于遭到清军的步步进逼,想为他的抗满斗争取得外援。因此,他决定从朝里派一位使臣去欧洲,以求得罗马教会和欧洲各国对他的基督教小朝廷的军事援助。最后,他把这个特殊而又艰难的使命交给了他所信任的卜弥格。

1650年11月25日,卜弥格带着皇太后和宰相庞天寿致罗马教皇、耶稣会总会长、威尼斯共和国元首的信,以及永历赠送给他们的

礼物来到了澳门。1651年1月1日，他乘葡萄牙的轮船从澳门出发，经琼州海峡、安南、柬埔寨、马来半岛、马六甲海峡、尼科巴群岛、印度南端的科摩林、科钦，于1651年5月又到了果阿。来到果阿之后，他却遇到了他所没有料想到的困难。因为里斯本的葡萄牙政府这时已经知道清朝成了中国新的统治者，他们当时正在与荷兰争相发展对华贸易，希望取得主动地位，尽快地和清朝建立贸易关系，为此他们下令葡萄牙去澳门的商船回避一切使清政府不高兴的事。此外，果阿的葡萄牙政府也不同意永历在事先没有告知葡萄牙国王的情况下，就去欧洲和一些欧洲国家发生关系，他们对他派遣使臣很不满意，卜弥格来到这里，也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因此，他们下令不准他离开果阿。

1651年12月上旬，卜弥格在果阿住了半年之后，决心不顾葡萄牙的禁令，设法逃离这个地方。由于考虑到去欧洲旅途的艰难，他便将他在在中国得到的书籍和他的一些著作手稿留在这里。12月8日，卜弥格终于避开了果阿葡萄牙的岗哨，和他的中国旅伴一起去了印度内地，后经戈尔孔达、霍尔木兹海峡岸边的阿巴斯港、设拉子，来到波斯的首都伊斯法罕，又从伊斯法罕经哈马丹、里海南岸和大不里士，东土耳其的埃尔祖鲁姆、特拉布宗、士麦那，于1652年12月来到了威尼斯。

卜弥格来到威尼斯后，又遇到了新的困难。当时欧洲存在两个政治上互相对立的同盟，一个是拥护哈布斯堡天主教集团的教会国家的同盟，属于这个同盟的西班牙在军事和政治上有很大的势力；另一个是反哈布斯堡集团的同盟，它的成员国有信仰新教的丹麦、法国和瑞典；英国、俄国和荷兰也支持它们。威尼斯为了维护其经济和政治利益，不愿参与这两个同盟的任何一方。与此同时，威尼斯的耶稣会教徒也正遭到驱赶，而卜弥格不仅是一个耶稣会传教士，而且是以一个带有政治使命的使臣身份到这里来的。因此，威尼斯元首出于宗教原因，也出于政治原因，不愿公开接见卜弥格，担心卜弥格使团的来到，会产生不利于威尼斯的政治影响。